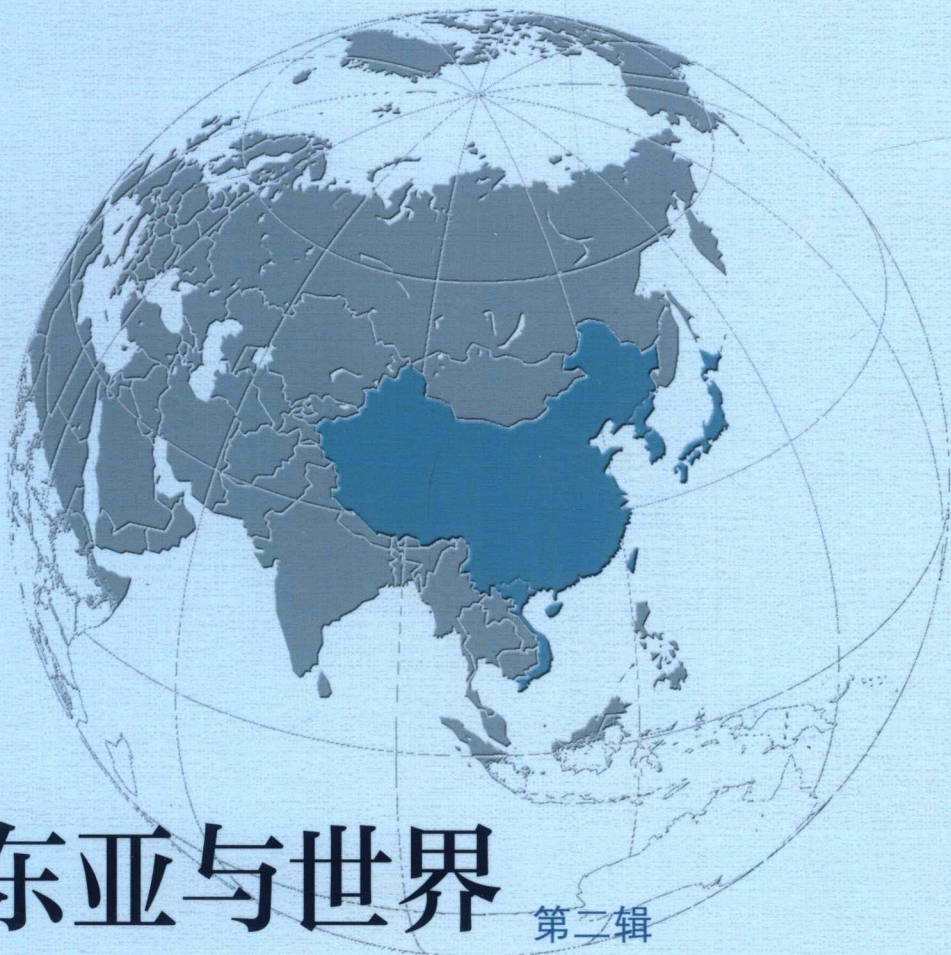




东亚与世界

第二辑

东亚与西方的观念迁移与互动

孫承會
沈国威 主编
李雪涛

東アジアと世界

東西の近代新概念の移動と受容

동아시아와 세계

동서 근대적 신개념의 이동과 수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东亚与世界

第二辑

东亚与西方的观念迁移与互动

孫承會
沈国威 主编
李雪涛

東アジアと世界

東西の近代新概念の移動と受容

동아시아와 세계

동서 근대적 신개념의 이동과 수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与世界. 第2辑, 东亚与西方的观念迁移与互动/孙承會,
沈国威, 李雪涛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097-7112-9

I. ①东… II. ①孙… ②沈… ③李… III. ①文化交流—
研究—东亚、西方国家 IV. ①G131.05 ②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7832 号

东亚与世界 (第二辑)

——东亚与西方的观念迁移与互动

主 编 / 孙承會 沈国威 李雪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冯立君 胡 亮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15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112-9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东亚与世界》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孫 承會 沈 国威 李 雪涛

编审委员

中 方 邵 建国 徐 一平 魏 崇新

日 方 藤田高夫 中谷伸生 松浦 章 内田庆市

韩 方 盧 相来 金 良宣 禹 在鎬

鸣谢:

이 책의 출판은 한국연구재단 BK21 플러스

글로벌동아시아문화콘텐츠사업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이루어졌음

本辑由韩国研究财团 BK21+Glocal 东亚文化媒体事业团资助出版

本号は、韓国研究財団の BK21+グローバル東亜細亜文化コンテンツ
事業団の助成による

目 录

东亚与西方的观念迁移与互动

- 利玛窦世界地图及其思想史意义 李雪涛/ 1
- 加藤弘之의 洋學受容과 ‘天’觀念의 變容에 관한 一考察 김도형/ 21
- 严复和他的门生熊元锷 沈国威/ 55

东亚及世界语境下的国别历史研究

- 从乙未事变看明治时期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行模式 姜 瑛/ 73
- 日本近代天皇制における西洋的要素に関する一考察 秦潇潇/ 87
- 『特命全權大使米欧回覽實記』を中心に 정호윤/ 97
- 中日戰爭期汪精衛와 식민지 朝鮮 (人)

知识迁移中的文学、艺术及翻译

- 魯迅とキリスト教に関する絵画と建築 陳 維/ 109
- 大正期における日本人の中国江南イメージ 辜承堯/ 119
- 芥川龍之介の『支那遊記』と青木正児の『江南春』をて
がかりに
- 胡适的戏剧翻译思想和实践 吴礼敬/ 129
- 汉画题材在日本狩野派绘画的继承和发展 程 茜/ 141
- 以张良“圯上敬履”画题为中心
- 『M.バタフライ』におけるソンの「東洋女性」の成立 劉灝霖/ 153
- 일제강점기이석훈의이중어소설연구 신미삼/ 163
- 《厚生新编》：日本江戸兰学举隅 徐克伟/ 187

趙無極よりみる中国におけるアンフォルメル様式の展開	中島小卷/ 199
---------------------------	-----------

东亚间的思想互动

论阳明及其后学中的良知、鬼神与气	傅锡洪/ 209
근대초기조선과중국의단발（斷髮）여성에대한인식변화	장아름/ 223
藤塚鄰の韓国儒教認識	李曉辰/ 239
——『清朝文化東伝の研究』を中心に	
한국의 동아시아론과 정체성의 문제	정남희、노상래/ 249
동아시아학 지적구조의 계량적 분석	박지영/ 265
编后记	283

利玛窦世界地图及其思想史意义

李 雪涛

Abstract: The Age of Discovery triggered the European global expansion and the organized effort for the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 faith. Accordingly, western geographic knowledge found its way into East Asia. The world map composed by Matteo Ricci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It is the result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Jesuit priest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with intensive study of Chinese files and fieldwork. As such, it is not only a Chinese rep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map, but a fresh frui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The immediate influence of Ricci's world map, however, cannot be overrated because the dominant traditional view of world prevented the Chinese from paying adequate attention. Worse than that, the map found strong resistance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 who feared the alien geography would jeopardize the orders of Chinese tradition. By contrast, the map facilitated national awakening in Japan and exerted significant impact on Japanes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Key-words: Matteo Ricci world map history of ideas

16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被派往东亚传教,近代西方地理知识被介绍到中国、朝鲜和日本。从此以后东亚逐渐拉开了重新认识世界的序幕,东亚传统世界观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近代世界观所逐渐取代。作为“学术传教”重要的一环,传教士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狂妄自大的华夷观,希望能以此

为契机，让中国人接受其所传的基督教教义。1583年，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进入中国之初，在广东肇庆首次展示了其所绘制的世界地图。这一幅与当时中国人几千年来所认识的世界决然不同的图像，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之后的几年中，利玛窦对世界地图多次加以改进，刊印了多版。随后，该图传入朝鲜、日本，在日本传播甚广，不仅受到了日本社会各界的欢迎，江户时代（1603~1867）的文献广泛征引、摹绘，而且出现了以利玛窦地图为原型制作的多种世界地图。这些都给日本的传统世界观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并为日本向近代世界观的转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随着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出现以及稍后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所携带的七千册西文书进入中国，^[1] 西方知识、思想和信仰在随后的两三百年间，慢慢地瓦解了几千年来的华夷思想及中国中心说。在缓慢的历史进程中“西方”这样一个新的他者被逐渐建构起来，使中国知识界认识到，他者并非仅仅为中国周边的“撮尔小邦”。翻译过来的天主教的教义以及技术方面的书籍并没有真正动摇中国文化的基础，而西学中关于天文和地理知识的“异质性”却随时可能颠覆中国传统的基础。

一 利玛窦及其所绘的世界地图

1578年，利玛窦获得耶稣会批准参加赴印度传教团，在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的邀请下，于1582年赴澳门，学习和研究汉语，并于次年与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神父一起进入了广东肇庆传播福音。利玛窦以其科学知识适应中国文化的基督教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后来他的传教方法成为教会本土化（inculturation）的先锋。

据利玛窦晚年的回忆，当时的肇庆知府王泮（自1580年始任肇庆知府），对利玛窦所悬挂在教堂接待室墙上的西文世界地图很感兴趣，希望利氏能将其翻译成中文。利玛窦认为这是一次开创传教良好条件的好时机，便开始着手地图的翻译和绘制工作。利玛窦“趁机加进有关中国人迄今尚不知道的基督教神

^[1] 李之藻在1623年为艾儒略《职方外纪》作序时提到七千部西洋书入中国的事情：“金子者，赍彼国书籍七千余部，欲贡之兰台麟室，以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者也。”见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6，第7页。

迹的叙述。他希望在短时间内用这种方法把基督教的名声传遍整个中国。”^[2] 由于汉字比西文的字母占据更多的空间,因此利玛窦所绘制的这幅汉字的世界地图要比西文的世界地图的篇幅更大。^[3] 1584年,利玛窦所绘制的中国第一幅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在肇庆完成,名为《山海輿地图》。为了迎合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使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容易地接受它,利玛窦对原有的世界地图做了调整:“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这位地理学家因此不得不改变他的设计,他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这更符合他们的想法,使得他们十分高兴而且满意。”^[4] 16世纪以来,欧洲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都是将穿过福岛(Forteuentura)的零度经线置于地图的中央,这样美洲就位于了地图的左侧,欧洲、非洲和亚洲就位于了地图的右侧,而中国就位于了最右边。利玛窦所刻印的世界地图,遵循的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90~168)定位的加那利群岛所在经线为本初子午线,只是将中央经线东移了170°,从而将中国放在了世界的中央。这样,欧洲、非洲和亚洲就被移到了地图的左侧,而美洲则被移到了地图的右侧。遗憾的是,利玛窦1584年在肇庆刊印的这一幅《山海輿地图》原本已经不复存在了。

据利玛窦后来的回忆以及后世学者的研究,利玛窦后来在南昌(1595)、南京(1600)以及北京(1602)多次对他的世界地图进行修改重订。其中1602年利玛窦在北京完成的世界地图可谓所有这些地图之中的集大成者,也是利玛窦制作的地图中最为完善的版本。在北京,利玛窦结识了士大夫信徒李之藻(1569~1630)并与之成为好友,在其鼓励和支持下修订原有的中文世界地图,于1602年秋完成了这幅划时代意义的《坤輿万国全图》的制作。^[5]

^[2]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80页。

^[3]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0页。

^[4]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0~181页。

^[5] 现存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多为《坤輿万国全图》。李之藻的原刻板共有七件,分别保存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两件)、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原克莱芒学院(此图现在下落不明)、博洛尼亚大学天文台所(仅剩两屏)。此外,还存有刻工私刻版一件,清初刻版三件,以及若干彩色摹绘本。彩色摹绘本的特点是上面有各种动物和船只。

《坤輿万国全图》为六幅条屏组成，主图为椭圆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輿万国全图”），右上角为“九重天图”，右下角为“天地仪”图，左上角为“赤道北地半球之图”和“日蚀图”、“月蚀图”，左下角为“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和中气图（所表示的是在平面圆上画节气线的方法），另外还有“量天尺”图位于主图内左下方。除了图之外，《坤輿万国全图》上的文字主要有利玛窦署名的论说、序文三篇，李之藻序一篇，吴中明为1600年南京版所写的序一篇，此外还有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等的题跋三篇。^[6]在图首的下部有耶稣会的方形印记，为耶稣会的会徽，可见利玛窦将绘制地图的工作视为耶稣会的活动的一部分。^[7]

在1602年刻印的《坤輿万国全图》中，利玛窦还加入了很多适合中国士人阅读的注释，他在图上还尽量使用中国人在古籍中已经使用过的旧地名来翻译当时的地名。这一版本的地图刻印了数千幅之多，利玛窦除了在知识分子中传播这幅地图之外，更大的野心是要让万历皇帝了解到这幅地图。早在1601年1月27日（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利玛窦就曾以“大西洋陪臣”的名义将《万国全图》一册献给了万历皇帝（1573~1620）。^[8]这幅世界上第

现存所知的版本有南京博物院藏本、韩国首尔大学藏本、日本大阪北村芳郎藏本、美国凯达尔捕鲸博物馆藏本、理格藏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详见黄时鉴、龚缨晏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36~155页。

^[6] 《坤輿万国全图》中的所有文字收录在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171~226页）与黄时鉴、龚缨晏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63~182页）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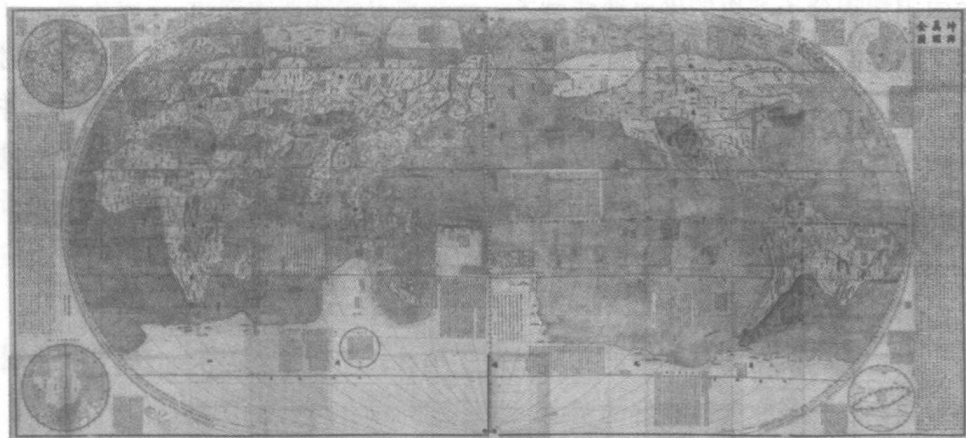
^[7] 《坤輿万国全图》上的文字曾被译为西文：①1918年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 1875~1958）发表文章，将英国皇家学会所藏的《坤輿万国全图》中的主要文字译为英文：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world map of Father Ricci”, 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18, pp. 367~385. ②1938年德礼贤（Pasquale M. D'Elia, 1890~1963）出版了《利玛窦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图》[*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 S.I.* (3. ed., Pechino, 1602) conservato presso la Biblioteca Vaticana,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938]，该书以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坤輿万国全图》为底本，将图上的序跋题识和说明文字等译成了意大利语。

^[8] 《正教奉褒》，收入《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239~383页，此处见第259~260页。此外尚见利玛窦书信，收入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附录二十七·利氏向大明皇帝呈现礼物的奏疏”

一幅的用中文刻印的世界地图，实际上也是利玛窦传播基督教适应政策的一个实际应用。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的说明中说：“其各州（洲）之界，当以五色别之，令其便览。”^[9] 本文做依据的版本系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狩野文库”（Image database of the Kano Collection, Tohoku University Library）重新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尽管没有用五色来区别五大洲，但的确是用了大致五种颜色来区分国家。其底本与 1936 年（民国二十五年）禹贡学会影印版的《坤舆万国全图》应为同一个，只不过“狩野文库”版上了色并且将所有字体重新修整过而已。禹贡学会版的地图没有耶稣会印章，“狩野文库”版上有一枚耶稣会印章，而“钱塘张文煮过纸、万历壬寅孟秋日”的题款都是相同的。^[10]



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狩野文库”重新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

二 利玛窦绘制世界地图的动机

利玛窦绘制世界地图的动机当然是在传教。这一点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多封书信中都予以了明确的说明。他认为，既然地方行政长官对世界地图感兴趣，他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消除一般中国人对于西洋乃至天主教的疑虑，最

之后。

^[9] 上揭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 175 页。

^[10]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 222 页。

终为世界地图进入宫廷做准备。作为屏风的世界地图赢得了万历皇帝的兴趣，这与利玛窦所谓学术传教、上层路线的传教策略是相符的。此外，对利玛窦来讲，通过世界地图消除一般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他民族面前妄自尊大的气焰，承认中国仅仅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从而接受天主教教义，这应当是利玛窦译介世界地图给中国士人最根本的想法吧。利玛窦世界地图告诉了中国知识分子，世界非常之大，亚细亚仅为世界的五分之一，而中国只占亚细亚的十分之一，中国既不是浩大无边的唯一大国，也不再雄踞世界的中心，而是跟其他国家一样，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因此，中国人应当承认其他国家、文明的存在，进而信仰普世的基督教。而这一点从李之藻在图中所作的序“今观此图，意与暗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于兹不信然乎”^[1] 可以看到，利玛窦的目的在少数中国知识分子那里确实已经达到了。

遗憾的是，利玛窦这样的一种传教思想，也决定了他的世界地图的传播对象——他绘制的地图大多为明朝官员和士人所拥有，这些官员和士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利玛窦所传入的近代天文和地理知识意义所在，从万历皇帝到士人，很多人只是将这一世界地图看作是可供欣赏的装饰物而已。

三 利玛窦世界地图所带来的西方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

尽管利玛窦希望借助于西方科学知识传教，但对于当时的耶稣会士来讲，科学知识是上帝完美性最好的明证，而天文学、地理学、制图学、数学、医学、植物学等都是他们宗教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当时很多的科学发明和在科技上的重大发现都是在耶稣会的学校或研究机构中出现的。

利玛窦在绘制世界地图的同时，也将当时欧洲的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带到了中国。其中包括了地圆说、水晶球体系的宇宙学理论（九重天的宇宙结构）、日月食、经纬度及其测量、五大气候带的划分、海陆的分布、椭圆形投影制图法以及当时欧洲对世界的最新认识，如五大洲等（由于在16世纪尚未发现澳大利亚，因此图中并没有绘制大洋洲）。利玛窦创制了大量地名的汉译，并通过注释介绍了世界不同地方的自然地理、物产资源、人文风俗等，极大地开阔

^[1]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80页。

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利玛窦在介绍这些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来讲极为陌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大都是从中国古代的知识入手的。最初的翻译当然需要用本土固有的语词、典故去一一对应，其中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用历史上的知识和记忆，来“格义”新的知识。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文学、地理学知识融入世界地图，不仅让中国知识分子更容易理解，同时也会让中国人感到亲切。利玛窦在地图的开篇中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清内”。^[12]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浑天说”这个比喻已经比较含糊地提出了地是球形的概念。利玛窦所撰写的《论地球比九重之星远且大几何》中在汉语中首次使用了“地球”这一概念：夫地球既每度二百五十里……。^[13]后汉流行的宇宙观念中就有“浑天说”，形容天地的形状像鸡蛋，天在外如蛋壳，地在内如蛋黄，天地俱乘气而浮，载水而行。^[14]

在利玛窦地图上在高加索地区有“女人国”：旧有此国，亦有男子，但多生男即杀之，今亦为男所并，徒存其名耳。^[15]尽管这跟《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风马牛不相及，^[16]但是中国人并不觉得陌生。其他的很多说明文字，很多出自中国古代文献，如《五代史》《隋书》《文献通考》等。^[17]

正是由于运用了中国古代的有关天文和地球的学说作为引子来解释西方相关的知识，也使得中国学者产生了一些误解。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认为利玛窦的地圆说是其到了中国之后根据浑天说提出的粗浅之见：“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浑天说——引者注），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谓地形之果如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駮者。”^[18]他认为利玛窦见识狂妄，遑论他人。

[12]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73页。

[13]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77页。

[14] 《隋书》卷十九引《浑天仪注》：“天如鸡子，地如中黄。”

[15] 上揭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11页。

[16] 这一“女人国”源自欧洲关于亚马逊人的传说。请参考周振鹤《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载《读书》2008年，第6期，第84页。

[17] 上揭《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74～76页。

[18] 王夫之著《思问录》，北京：中华书局，1957，第63～64页。

利玛窦世界地图上标有 1113 个地名，包括大洲、大洋、国家、地区、内海、山脉、河流、湖泊、岛屿等。由于地图上没有行政区界和城市的符号，因此只能概略地表明地理位置，而国家名、地区名和城市名等也不容易区分。所使用的很多外国地名、专用名的译名是从中国古籍中来的，也有不少利玛窦独创的译名一直沿用至今：亚细亚（Asia）、欧罗巴（Europa）、亚墨利加（亚美利加，America）、罗马尼亚（罗马尼亚，Romania）、罗马（Roma）、那波里（Napoli）、加拿大国（Canada）、古巴岛（Cuba）、智里（智利，Chili）、牙卖加（牙买加，Jamaica）、大西洋（Occidentalis Oceanus）、地中海（Mediterraneo, mare）、北极、南极和赤道等。当然，有很多的国名和地名已经改变了：“拂郎察”是今天的法国，“谙厄利亚”（Anglia）是今天的英国，“福岛”（Forteuentura）是今天的卡内利群岛，“大浪山角”（C. de Buona Speransa）是今天的“好望角”等等。

利玛窦世界地图给中国带入了地理新知识，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原来的天下观转变为了真正的世界观，从而改变了当时士人普遍的朝贡心态，这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冲击，可谓重大。

四 形式上的意义

地图作为一种叙述方式，提供给观看者一个具有平面空间定位的世界。利玛窦世界地图，整体看来就像是一副中国画：除了主体的地图之外，还有外加方框的众多题跋以及说明性的文字，从而构成了一种空间上的对话。由于在一幅地图上往往要给出地理位置、天文知识、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特色物产等多种信息，因此这幅地图跟当时欧洲流行的同种地图来比较的话，篇幅要大得多。众多的说明文字，是为了补充地图描绘的不足。另一些的序跋题识，说明了地图编绘的原因和经过，其中既有作为主要创作者利玛窦的说明，同时也有他的中国合作者的回应。由于中国和亚洲部分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有很多的记载，因此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这两部分跟欧洲当时的世界地图相应的部分相比也要详实得多。

翻刻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冯应京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无远弗届，是耶非耶？”《尚书》所谓不管多远之处，没有不到的，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在地图上

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视此图仅五分之一耳”，^[19]而过去常说的“声教广被，无远弗届”仅仅是一句诳语而已。

此外，地图上有很多对中国人不熟悉的地方的地理特征和特产的描述，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眼界，如对于非洲的介绍是：“利未亚最多虎、豹、狮子、禽兽之类。有猫出汗极香，以石拭汗收香，欧逻巴多用之。”^[20]此外也有中国人知道的地方，但对其地理特征及特产等了解不够的，如对印度的描述：“应帝亚总名也。中国所呼小西洋（印度洋——引者注），以应多江为名，一半在安义江内，一半在安义江外。天下之宝石、宝货，自是地出。细布、金、银、椒料、木香、乳香、药材、青朱等，无所不有。故四时有东西海商在此交易。人生黑色，弱顺。其南方少穿衣。无纸，以树叶写书，用铁锥当笔。其国王及其各处言语不一。以椰子为酒。五谷惟米为多。诸国之王皆不世及，以姊妹之子为嗣，其亲子给禄自赡而已。”^[21]自佛教在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印度有一定的了解。但除了佛教和历史之外，对印度地理等整体的认识，依然不完整。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介绍，无疑可以帮助当时的知识分子比较全面地认识与中国相邻这一次大陆的地理和物产情况。

五 本土化与互动

利玛窦世界地图并非西方地图的一个简单的汉语译译，到目前为止学者大都认为，利玛窦世界地图传入中国乃至东亚，所产生的影响是单方面的，亦即仅仅是西方的近代地图学和地理学知识向中国的流布。我们通过对利玛窦地图以及上面提到作者姓名的题跋文字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份地图实际上是利玛窦在参考了西方的世界地图原本后，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用本土的概念、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去解释世界地图的努力综合后得出的结果。这些印在各大洲之间的利玛窦与中国学者的互动文字，体现了对世界观审视的多元视角。利玛窦地

^[19] 转引自林东阳《明末西方宗教文化初传中国的一位重要人物——冯应京》，收入《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转变与延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第230～231页。

^[20] 上揭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12页。

^[21]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12页。

图的中国士人合作者，除了撰写序跋的作者外，今天能够确定的有：1602 年版本的合作者李之藻（1565～1630）、刻印者张文燾、1603 年《两仪玄览图》的李应试（1559～1620）等多人。利玛窦世界地图是在中国明末绘制的，是以利玛窦、李之藻等西中知识分子相互之间的互动、交流而产生的文化的创造。

在有关中国部分的编绘过程中，利玛窦和他的中国助手们无疑参考了众多明代的舆图以及利玛窦本人对中国众多地方的实地测量，这些知识反过来也丰富了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当时可供利玛窦参考的地图有《大明一统志》中的附图（1457～1464 年刻本），罗洪先（1504～1564）的《广舆图》（1561 年刊印），喻时（1506～1571）的《古今形胜之图》（1555 年重刻），徐善继、徐善述（1353～1419）的《地理人子须知》一书所附的《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1522～1566 年刻本，1583 年重刊），《扬子器跋舆地图》（1512～1513 年绘本）等等。^[22] 跟在西方绘制世界地图的科学家比较起来，利玛窦有他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人在中国，由于早年受到过良好的科学训练，熟悉数学投影原理，在传教的途中，他能够准确测量一些重要城市和地域的经纬度。他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中也说其资料来源之一就是自己的“积岁札记”。^[23]

尽管由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被称作“利玛窦世界地图”，但显然他不是这幅地图的唯一作者。作为地图传播者的利玛窦在与中国的合作者讨论的过程中，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世界地图，在一定程度上，他本人同时也是一个接受者。这也是利玛窦在华的二十多年中不断改进他的世界地图的原因所在。

当然，明代的中国地图原图与近代西方地图绘法不同，全部都是使用平面投影“计里画方”法：这种先在图上布满方格，然后按方格绘制地图内容，以保证一定的准确性的方法，是天圆地方观念的实际运用。如果要与当时利玛窦翻译、改造的地图匹配的话，必须将之改用西式投影法绘制。因此，以上所提到的这些中国原图，在没有经过利玛窦的改造之前，是没有办法直接为其所用的。

^[22] 相关的研究见上揭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六章“利玛窦世界地图的资料来源”之二“中国文献资料”，第 72～79 页。

^[23] 相关的研究见上揭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 79～81 页。

利玛窦以当时的西洋世界地图为底本，将东西方对世界的认知汇编、集中在了他的世界地图中，并使中国位于了图的中央，部分地顺应了中国的传统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今天在中国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一直沿用了这一“利玛窦规则”。

六 思想史上的意义

中国古代人认为，天和地都有同一个中心，这一超越时空而存在的圆心就是所谓的“道”之所在。而宇宙的结构是一层层的同心圆。中国文化传统对世界有三个基本的认识，这包括：一、天圆地方说，按照这一说法，天是圆的，而地是方的；二、中国居于天下的中心；三、只有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其他的国家不过是撮尔小邦而已。这样的认识，使得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以中国为天下的“天下观”，而没有“世界观”（world view），因为他们视中国以外的国家为四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尽管在汉代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航海到了印度东南海岸与锡兰，唐代已经远至波斯湾、巴格达，而到了郑和时代更到达了东非海岸，但直到明末，“天下”依然等同于“九州”，中国人认为其四周分别是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以中国为天下的观念并没有因此而根本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到清初，学者李光地（1642～1718）依然说“自西人利玛窦辈入中国，言地原无上下、无正面，四周人著其上，中国人争笑之”的原因所在。^[24]

天圆地方的观念不仅是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它同样在制图学方面也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自西晋裴秀（223～271），中国传统的地图绘制就一直是以如棋盘的平面为基础的，遵循所谓“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的原则，一直到明末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新。

利玛窦世界地图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大地球形说、等积投影、方位等距极地投影等地图投影学、地球五带划分、海陆分布、名山大川、国名地名等自欧洲古代到文艺复兴以来地理学的基本观点。正如郑观应（1842～1921）所指出的那样：“及西人跨海东来，地球图出，夫然后五大洲之土地，数十国之名号，

^[24] 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